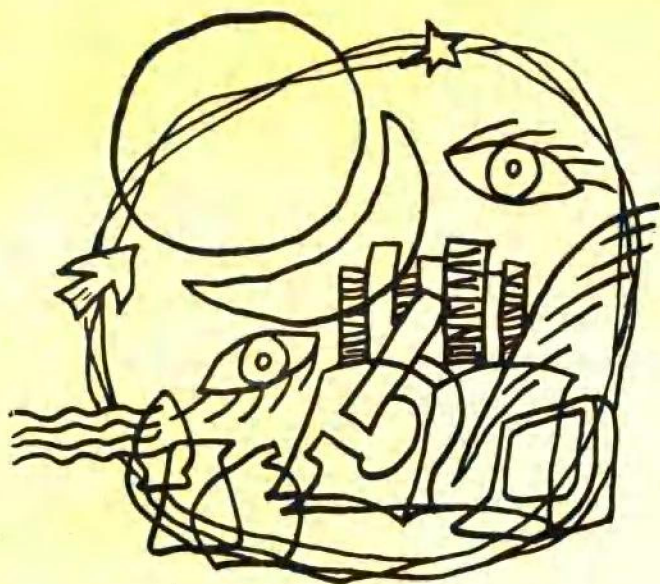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

增长型调整政策理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 潘英丽 著

国际金融系列书

增长型调整政策理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沪)新登字第201号

增长型调整政策理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潘英丽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 本

ISBN 7-5617-1152-2/F·046 定价: 11.70 元

前 言

调整引起经济衰退，而迅速的经济增长则引起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通货膨胀，这两种状况的不断交替已构成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形成这种曲折的根源是什么？一国能否实现增长型的调整以及没有需求膨胀和供给缺口的增长呢？本书以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以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同国际金融组织的相互关系为背景，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理论研究。作者发现：

1. 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资源投入和效率增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源泉对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资源投入是增长的主要源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效率增进成为愈益重要的增长源泉。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国必须实现增长途径的适时转换和适当配合。

2. 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缺口（或总体效率损失）的扩大是增长途径失衡（而非过度增长）的基本表象。未能实现增长途径适时转换和适当配合，长期走高投入—高增长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会陷入国内高通货膨胀和对外高额负债的困境。

3. 片面紧缩总需求的经济调整（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稳定规划）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它导致资源投入的大幅度削减，却没有实现效率的增进和增长途径的重点转移，总增长率必然

下降。

4.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增长导向的经济调整,才能实现无需求膨胀和供给缺口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增长导向经济调整的基本特征在于把实现内外平衡或实现适度国际收支、适度通货膨胀率和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组合的调整任务在需求和供给方面进行适当分配,充分挖掘效率增进这一增长源泉,实现增长途径的转换和适当搭配。增长途径的转换和适当配合,不仅意味着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或转变,而且意味着深刻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是增长导向经济调整同其他经济调整的根本区别。

5. 内部危机的深重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使债务沉重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除了少数国家有幸摆脱债务和发展危机,大多数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 90 年代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已“被遗弃十年”还将继续“被遗弃”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发展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适时的改革开放从而适时的增长途径的转换是一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才有可能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导 论	(1)
第一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	(2)
第一节 世界经济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	(2)
第二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作用	(22)
第三节 “增长导向调整”的提出和基金组织观念的转变	(28)
第四节 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方法	(46)
第二篇 目标分析	(53)
第二章 目标变量的决定和变动	(54)
第一节 国际收支的决定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原因	(54)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演进机制	(66)
第三节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84)
第三章 目标变量的相互关系与适度目标组合	(95)
第一节 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和适度国际收支目标	(95)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影响与适度通货膨胀率的确定	(107)
第三节 适度增长率和适当的增长途径	(122)
第四节 经济冲击与经济调整	(133)

第三篇 政策分析	(150)
第四章 需求管理政策	(152)
第一节 货币政策及其传递机制	(152)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158)
第五章 供给刺激政策	(173)
第一节 供给刺激政策在增长导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	(173)
第二节 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	(177)
第三节 提高生产能力增长率的政策	(191)
第六章 汇率政策	(200)
第一节 贬值幅度的确定	(200)
第二节 贬值的影响	(207)
第三节 汇率制度的选择	(214)
第七章 外部融资政策	(229)
第一节 外部融资的意义和债务危机的教训	(229)
第二节 债务适度规模与偿债能力的决定因素	(238)
第三节 债务管理	(246)
第四篇 分析的综合和扩展	(252)
第八章 政策的相互关系和适度组合	(253)
第一节 稳定政策的相互关系和配合	(253)
第二节 供给刺激政策的相互关系和协调	(264)
第三节 稳定政策与供给刺激政策的相互关系及其配合	(268)
第四节 调整与融资的相互关系	(273)
第五节 不同经济条件下适度政策组合的特殊规定性	(277)
第九章 政策改革的动态过程	(294)
第一节 改革的可行性问题	(294)
第二节 改革成本的最小化问题	(302)
第三节 改革的速度和顺序问题	(312)
第十章 调整的外部环境	(323)

第一节 南北相互依存关系的不对称性及其影响	(323)
第二节 调整的外部环境	(332)
参考文献	(348)
后记	(358)

第一篇 导 论

本篇由第一章构成。我们首先回顾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世界经济环境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困难，以及不同组别的发展中国家在调整方面所作的不同努力。其次，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 and 解决债务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讨论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和基金组织支持的以稳定为目标的调整规划的缺陷。第三，追溯增长导向调整概念经过酝酿、形成、提出和最终为基金组织肯定和接受的整个过程。最后，简要地讨论发展中国家增长导向经济调整面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介绍本书的意图和基本结构。

第一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 中国的经济调整

第一节 世界经济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

如果说增长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 50 和 60 年代的主旋律，那么调整就是 80 年代痛苦的必需品。70 年代则是从乐观的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向前景黯淡的紧缩时期过渡的多事之秋。

一、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简单回顾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时期。在此期间，工业国实现了高就业、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快速增长。1948—1971 年间，除美国没有达到二次大战期间的水平，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率都达到了本世纪的最高水平^①。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了非殖民化，取得了民族独立，并开始走上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国际条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有利。世界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7.3%，实现了有统计资料记载以来的最高纪录^②。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开始

①② 参阅 Griffith-Jones, Stephany, 'Impact of World Prices on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S. Griffith-Jones and C. Harvey (eds.), *World Prices and Development*, Gower, 1985.

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50年代初,世界银行把重点从复兴转入开发。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成立,其主旨是通过贷款和股份投资的方式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50年代后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放款,帮助它们克服短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1960年,世界银行建立国际开发协会,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多边来源的优惠资金。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国通货膨胀率每年在2%—4%的幅度内变动,实际利率处在2%—3%的较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在这有利环境中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每年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它们大部分是由官方的资本流入(贷款与赠款)和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弥补。商业银行贷款在60年代后期才有较大增长,但到1970年,它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总额中所占份额仍低于私人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要比工业国严重得多。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就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率。这主要是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高通货膨胀所致。该地区1955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内过于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及其相伴随的高额财政赤字等因素造成的。

虽然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确实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也不排除部分国家存在对内和对外平衡方面的困难。在1956—1970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加纳、印度尼西亚、秘鲁、土耳其和印度8国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达18次。50年代后期有10个国家从基金组织获取高档信用部分贷款,并按其条件限制进行经济调整。60年代寻求基金组织支持的国家逐渐增多。特别是60年代后期,每年有近30个国家获得基金组织资助。从地区上看,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严重通货膨胀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海地和萨尔瓦多等20个国家

从基金组织获得多笔贷款并实施其稳定规划。非洲和亚洲也有少数国家寻求基金组织支持并进行经济调整。

二、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困难

70年代和80年代的上半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变化。

1971年的美元危机和1973年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压力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行。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实行钉住某种主要货币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更大,更容易出现政策偏差和失误。

1973—1975年,石油的名义价格上涨4倍,1978—1981年石油的实际价格又翻了一番多。两次石油价格冲击导致世界各国经常项目的巨大不平衡。这给石油进口国带来了国际收支调整的艰巨任务。与工业国相比,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调整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首先,这是因为工业国通过向产油国的更大出口来偿付大部分额外多付的石油开支,使它们的国际收支受石油价格的影响要小得多^①。其次还因为工业国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主要由它们自己的政策决定,并且也更容易获得外部资金;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 and 增长受到工业国经济 and 政策的更大制约。它们的出口严重依赖工业国市场的扩大和开放程度,它们的外部融资需要也更严重地依赖工业国的援助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

① 主要石油出口国的进口性质使得石油收入对贸易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工业国的出口上。70年代,石油出口国将其石油收益的44%用以支付来自工业国的进口,而只有8%用以支付来自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参阅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55页。

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工业国发生严重经济衰退(详见表 1.1)。这两次经济衰退对世界贸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严重不利影响。70年代,世界贸易从60年代年平均增长8%降到5.7%。1982年,世界贸易下降2%,发展中国家贸易则下降5%^①。由于边际进口倾向总是大于零,工业国的经济衰退直接导致工业国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下降^②。另外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工业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强。因此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到双重打击,即承受石油价格的直接冲击和工业国转嫁的危机。前者使进口开支剧增,后者导致出口的大幅度下降。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经常项目的巨大赤字(详见表 1.2)。

巨额石油美元的出现和再周转使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以及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量盈余的石油美元流入国际资本市场,使得商业银行急于寻找资金的出路。另一方面,部分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逐渐建立起作为借款人的良好信誉。70年代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急剧增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发生两大显著的变化,即从股本转向债务和从官方融资转向私人融资。由于商业银行贷款期限短(其偿还期比官方贷款的偿还期短10—18年)、利率高(比官方贷款利率高3—8个百分点^③、浮动利率贷款比重大(浮动利率制度使商业银行能提供较长期限的贷款而不必承担短期利率

① 参阅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9页。

② 玛丽安·E·邦德(Marian E. Bond)的一项研究表明:非石油发展中国家实际总出口关于工业国的实际国民总产值的弹性为2.39。净石油进口国中的主要制成品出口国的这一弹性为2.91;低收入国家(不包括印度与中国)为1.28;其他净石油进口国为1.42。参阅 Bond, Marian E. 'Export Demand and Supply for Groups of Non-Oi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MF Staff Papers, Vol. 32, No. 1 (1985, 3)。

③ 参阅陈彪如教授的《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变动的风险), 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增加使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工业国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一条新的重要渠道。

受工业国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国际资本市场的实际利率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实际的伦敦银行拆借利率 (LIBOR) 70 年代在 2.7%—3.1% 之间浮动, 1974—1977 年连续四年为负值, 1978 年开始直线上升, 1981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6%, 整个 80 年代持续高昂, 只有少数年份稍有回落 (参阅表 1.3)。70 年代, 受低利率和商业信贷人的热情的鼓励, 发展中国家掀起借款的热潮, 导致债务的巨大积累, 80 年代, 高昂的国际利率则大大地加重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 (详见表 1.4 和表 1.5)。

如前所述, 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初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经常项目赤字在外部冲击下, 1975 年和 1981 年分别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4.3% 和 5.1%。国内通货膨胀在进口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详见表 1.6 和表 1.7)。

面对一系列外部冲击的情况, 一国通常有三种基本的调整方式: 第一种是结构调整。这是一种长期调整方式, 涉及有利于出口和进口替代生产的资源重新配置。随着国内储蓄的提高, 这种资源重新配置可降低一国贸易赤字。第二种是外部融资。它可以同第一种方式相结合, 通过增加进口和投资使一国赢得时间并在较少痛苦的情况下实现结构调整。但外部融资也可能仅仅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赤字, 以推迟必要的结构调整。第三种方式是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用限制进口来缩小经常项目赤字。不同方式的调整对一国经济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根据 70 年代所采取的调整方式的差异和 80 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实绩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组国家将外部冲

击看作持久的事态,并立即进行结构调整,从而避免了过度求助于举借外债。它们在 70 年代还奉行了比较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避免了高通货膨胀。同时它们将借来的外国资金用在生产上,缓和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投资于人力资源,扩大生产基础,而且避免了国营企业和政府财政预算的巨大赤字。由于它们在 70 年代作出及时和正确的调整,它们受 80 年代初期的外部冲击的影响较少。又由于通常负债不太重,它们受国际实际利率大幅度提高之害不多。而且因为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较低或因为奉行外向型结构调整政策降低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详见表 1.8),它们能较好地经受住 80 年代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的下降,避免了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参阅表 1.9)。当 1982 年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后,它们就能利用制成品出口的迅速扩大充分增加出口外汇收入,迅速缩小债务与出口比率并避免债务危机。这组国家在调整和增长方面取得很大成功。它们在 111 个发展中国家中占了 61 个,并大部分集中在亚洲,它们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大部分穷人。它们能持续得到来自私人和官方的自愿的国际资本流入。它们的经济也增长迅速。自 1980 年以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处在 4% 的水平,等于或超过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增长率。

另一组国家是 50 个债务沉重的国家。这个组别中约有一半是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它们深受其根深蒂固的结构弱点之害(参阅表 1.8)。它们的金融和基础设施根底很薄弱,出口部门大量依赖初级产品。70 年代中期由于初级产品市场增长缓慢而引起的出口下降比价格的不利影响严重 10 倍。其国际收支调整主要依赖外部援助。70 年代它们的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了。这些国家落后的农业技术条件和政府忽视农业的政策导致过分依赖粮食进口和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援。由于出口业绩不佳,

一些国家不得不把进口压到最低限度，结果损害了经济增长。它们也深受营养不良和低教育水平之害，人口的迅速增长使问题更加严重。它们 1973—198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5%。1980—1988 年这一比率进一步降到 -2.9%。其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达不到 20 年以前的水平。80 年代以来，它们的债务合计约为 1070 亿美元，主要是对官方债权人的负债。

这个组别中的另一半是债务沉重的中等收入国家。它们大部分集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面临 70 年代外部冲击时，它们把这些冲击看作是暂时脱离常规的现象，推迟必要的调整，结果使它们 80 年代的经济同 70 年代相比更为脆弱，受到 80 年代初外部冲击格外沉重的打击。一方面过度举借外债和低效率使用外资的错误政策导致债务的急剧积累，国际实际利率的上涨使它们受到极大伤害。另一方面，它们推迟结构调整，或实行进口替代的内向政策，从而未能改变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局面（参阅 1.8）。结果深受 80 年代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打击，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参阅表 1.9）。需要特别提一提这个组别中的石油出口国家。它们在 70 年代中期贸易条件有巨大改进，它们的实际进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1972—1976 年达到 16%。许多国家增加的出口收入不够它们投资和进口计划的开销。70 年代除了 1974 年以外的其他年份仍出现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并靠国际资本市场的商业银行贷款弥补。西方商业银行看在它们石油储藏的实力上面，也争先恐后地向它们提供资金。虽然它们在 70 年代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债务的巨大积累和 80 年代国际利率的持续高昂以及石油价格的急剧下降使它们的经济一蹶不振，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墨西哥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也是同样的难兄难弟。1981—1983 年以拉丁美洲出口单价的变动折算的实际伦敦银行折借利率分别

高达 19.9%、27.5% 和 17.4%，1986 年又高达 22%（见表 1.3）。因此拉丁美洲的高负债国家的债务负担不可避免地急剧增加。除了对外部冲击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反应外，高负债的中等收入国家还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国内政策。它们采取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和高通货膨胀。它们低效率地使用外资。借来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和替代国内储蓄^①，不少国家的投资效率不断下降^②。虽然这些国家具有技术较高的工人队伍和良好发展的工业基础，但在国内高通货膨胀和微观低效率的情况下，它们 80 年代的调整 and 增长面临很大的困难。它们的困难还由于外部自愿贷款的中断进一步加重。1982 年 8 月，墨西哥拒付债款的行动使许多债务沉重国家突然丧失资信，对多数高负债国家的自愿贷款停止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导致高负债国家资金净转移的逆转。高负债国家 1978—1982 年之间流入资金 610 亿美元，而在下一个 5 年中变为净流出 930 亿美元。由于 1982 年以前它们每年可从国外得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的资金，而在 1982 年以后每年大约要汇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3% 的资金。换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的 5% 用以抵销资金净转移的变化。结果它们的消费水平和净投资水平不得不下降。1980—1988 年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它们的实际人

① 许多国家过多依赖外部借款，过少动员国内资金。世界银行在对 36 个可得到它们国内金融体系负债数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它们在 1986 年底的外债金额超过了国内负债金额的 50% 以上。就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外债平均高于国内负债的 2.5 倍。参阅世界银行：《1989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23 页。

② 例如，阿根廷整个国民经济的增值资本—产出率（资本效率的倒数）从 1963—1972 年间的 4.4 上升到 1973—1981 年的 11。摩洛哥的这一比率从 1965—1972 年的 2.6 上升到 1979—1982 年的 6.7。世界银行关于 44 个国家的抽样调查表明，由于投资效率的下降和外部环境的恶化，1979—1983 年这些国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呈现出负的关系。参阅世界银行：《1985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51—52 页。